

恭聆 國父演講三民主義憶述

鄭季英

中國國民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六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台北舉行，正是我的母校——國立中山大學五十二週年校慶後一日，使我想起在母校親聆 國父宣講三民主義的情況，雖事隔

五十二年，猶歷歷在目，恍如昨日。

國父在母校宣講三民主義的開始日期是民國十三年一月廿七日，當時正是中國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期中，地點是在全國代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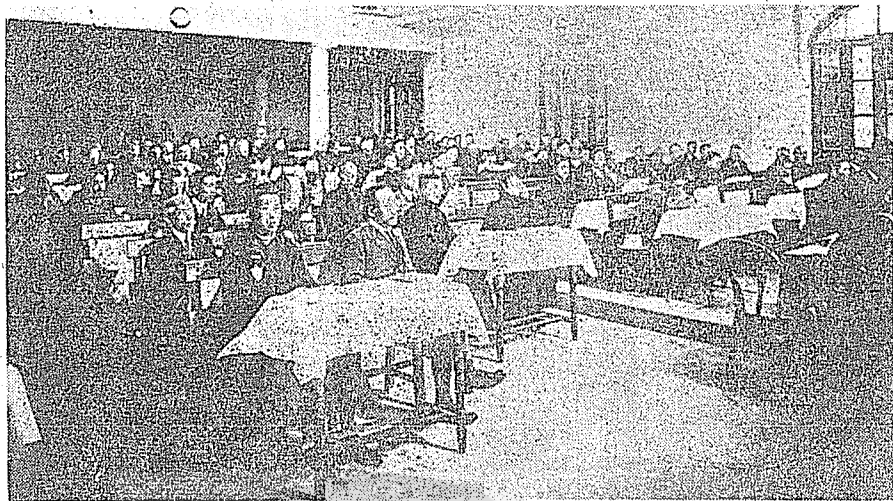
民國十三年國父五十九歲於是年一月二十七日開始演講三民主義。

會會場，也就是母校的大禮堂。當時母校的名稱還是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會後，才由 國父下令將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和廣東法科大學、廣東農業專門學校合併改組為國立廣東大學，於是年十一月十一日正式成立。 國父逝世後，又經中央決議改名為國立中山大學，以紀念 國父。

五十二年前，我還是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四年級的學生，雖然讀的是數理化部，但已接受革命的薰陶，並已由我的校長鄒海濱（魯）先生介紹，於年前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剛成為新黨員，聽到 國父來校宣講三民主義，自然非常興奮，便成為基本聽眾之一，每週按時前往聽講。

當年 國父宣講三民主義是有計劃的有系統的分次講演，每週一次，時間都是在星期日上午，什麼時間開始，已記不清楚，但都是在中午結束，有時到了開飯時間，演講還未結束，我們都仍專心聽講到結束後，才趕去膳堂吃冷飯剩菜。

計由一月廿七日至八月廿四日止，共講了十六次，其中民族主義六講、民權主義六講、民生主義



廣東高師禮堂內景——國父於民國十三年一月廿七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期間在此開始講演三民主義。

只講了四講，沒有講完，因為國父赴韶關督師北伐而中輟。其間也曾因故間歇了兩次：一次是三月廿三日講完民權主義第三講後，停了兩個星期，至四月十三日才講第四講，可能是因為國父公忙緣故。一次是四月廿六日講完民權主義第六講後，更停了三個多月，到八月三日才開始講民生主義。這固然是因為國父在五月間曾因腦痛和眼血管破裂就醫治療，也是因為民生主義的理論，比民族主義、民權主義為深奧，要有充分時間準備，所以停講若干時日，把民生主義講演的大綱擬好後，才繼續講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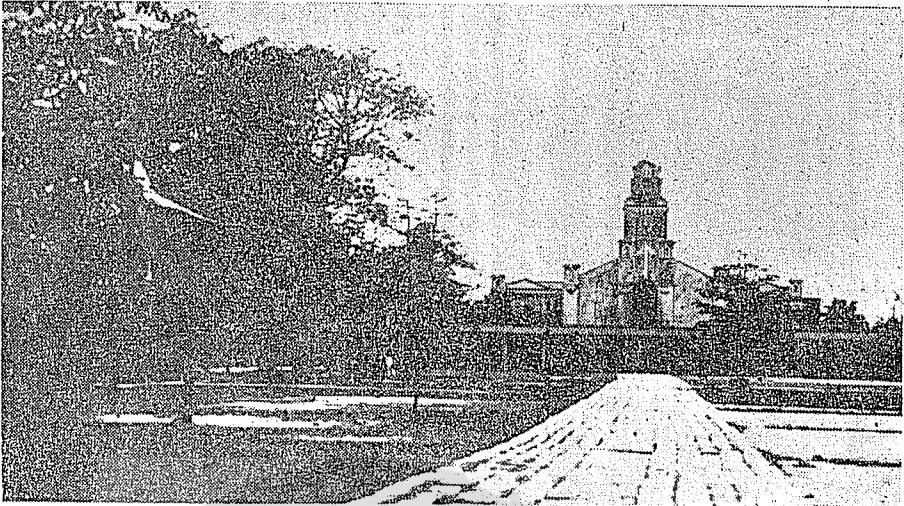
記得當時每次聽講的，包括黨國負責人、海內外同志、母校和其他學校學生和各界人士，數達二、三千人，將母校禮堂樓上樓下的座位都坐滿之後，還有些人站着四周聽講。國父來校時，常由校門外步行進來。母校的大門內有一個大操場，本來他的汽車可以經過大操場中的校道直駛到禮堂所在的大鐘樓門前，但他總喜歡走一段路，持着手杖，循着校道向大鐘樓前進，真是輕車簡從，杖履安詳。有人說：有時國父還走路來校，但我沒有看到，不能證實。

國父到校後，總是先上樓，到校長室，略事休息，便步入禮堂，登上講台，開始講演。他沒有事先寫好的講稿，似乎只是準備了一些綱要和資料，即席發揮。他講演時，態度從容，聲調鏗鏘，侃侃而談，內容非常充實，雖然是高深理論，但因運詞顯豁，趣味雋永，取材適切，深入淺出，極能吸引聽眾的注意和興趣。我當時雖然只是一個快要畢業的大學生，也聽得津津有味，越

聽越神往，越聽越有勁。及今追思，猶恍如目前。國父也越講越起勁，由始至終，毫無倦容。但當時國父正以一身兼理黨政軍事務，將革命事業從頭做起，在最繁忙的時刻，來作這一長期性系統性的演講，自極辛勞。據海濱先生記述：「總理演講的時候，聽眾都坐着，每見總理常把右手按在肝部，當時我以為這是總理近來的習慣，後來總理在北京病重，我由廣州前往侍疾，才知道總理肝病，由來已久」。終以肝癌於翌年病逝。但在當時聽講者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都祇覺得國父越講越精神，無不深為敬佩。

國父演講三民主義的時候，正是中國國民黨改組之始，也是大本營積極整頓政務、籌備成立國民政府之際；尤其在軍事上，全國尚未統一，廣東方面陳炯明的叛逆還未平息，滇軍桂軍亦多不穩，局勢仍動亂不安。國父在這樣的情勢下，為什麼還好整以暇的去講演三民主義呢？因為他認為這一演講比軍事的平亂、政務的整頓、黨務的開展都還重要。所以，無論怎樣繁忙，他都按時演講，而且花很多時間精神去作這一演講。因為國父認為過去革命失敗的原因是只注重軍事，而沒有基本力量，黨的改組便是要以黨為基本力量，從事黨員的奮鬥，而黨員的奮鬥方法則要宣傳主義，爭取人心，才可贏得勝利。這一道理，他在「國民黨過去失敗之原因與今後努力之途徑」、「軍隊戰勝與黨員奮鬥」、「國民黨奮鬥之法宜兼注重宣傳，不宜專注重軍事」等演講中，曾反覆說明，強調今後奮鬥的方法要注重宣傳

，不要專注重軍事。而要從事宣傳，便要有三民主義作宣傳的資料，使三民主義的思想，深入於



國父講演三民主義所在地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大禮堂外景。

人心，宏揚於世界，以為革命奮鬥、救國救世的最高準則，而國父手著的三民主義原稿為陳炯明叛亂，炮轟觀音山時所燬，因此，不能不作有系統的演講，以演講記錄作宣傳的課本，國父在民族主義印行時的自序中，便說明演講的緣起是：「茲值國民黨改組，同志決心從事攻心之奮鬥，亟需三民主義之奧義，五權憲法之要旨，為宣傳之資。故於每星期演講一次……而且希望同志讀者，本此基礎，觸類引伸，匡補闕遺，更正條理，使成爲一完善之書，以作宣傳之課本」，其意至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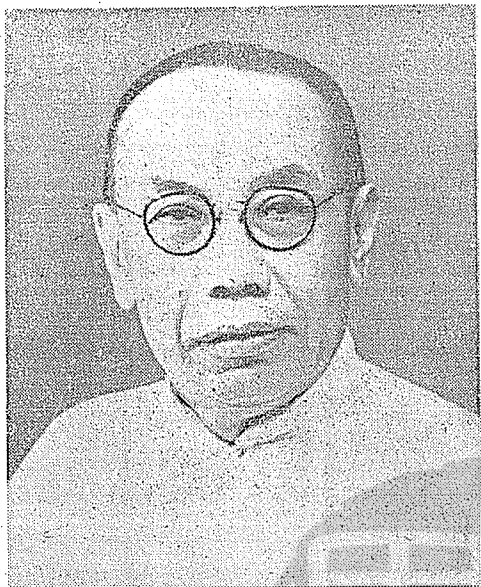
還有一點，就是國父的三民主義思想，雖然在立志革命之初，在與中會章程中便提出民族、民權的主張，在上李鴻章書中，便表現民生的思想；但三民主義的思想和主張，則在同盟會時期才完成，并隨着時代的演進而不斷發展。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國際情勢和時代思潮的急劇變化，國父的三民主義思想更有重大的演進；好像民族主義的中國民族自求解放和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張；民權主義的權能區分學說和地方自治的具體方案；民生主義的耕者有其田和節制資本的思想。這些，都是國父晚年主張而使三民主義思想益為光輝充實。因此，國父除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對三民主義的內容作了一精要的總說明外，更要作一有系統的闡述，使大家對三民主義有共同確切的認識。國父對三民主義的宣講，一面是對三民主義的內容，重新作一說明，使大家有共同的認識，一面以此說明爲基本，要大家展開宣傳，喚起

民衆，使由思想發生信仰，信仰發生力量。

國父宣講三民主義的目的，既如上述，所以他對這一系列演講，非常重視，并指定由我的老師黃昌毅教授擔任筆記，海濱先生擔任讀校。據黃昌毅先生記述：國父在事前便「召昌毅諭曰：『我要把三民主義宣傳到全國國民，但是沒有時間寫出來，想用講演式說出，你可不可以替我筆記呢？』昌毅對曰：『用這樣方法可以省却先生手書之勞，且收速成之效，自然是好極了。但是不知道我所筆記的文字，一方面是不是合先生的原意，一方面是否能令全國國民一目了然呢？』先生曰：『我們試試吧』。由此，便開始講演，據黃先生說：『最初二次演講民族主義時，先生必預書所講之綱目一紙，示昌毅以所講之範圍……後以紀錄之文字，尙合演講之原意，先生遂決用此演講法以宣傳三民主義……廢去預書之綱目』。據海濱先生記述讀校的經過：『每次聽清後的演講稿，先由筆記人呈送總理，總理看過後，就叫人送我讀校，先大體閱讀，核與總理所講原意，是否相符？如有不符的地方，則用另紙錄下，或改正，或補充，或刪節，反覆誦讀，必至大致不差，方逐字逐句讀校，而爲文句上的潤飾。直至文理已無瑕疵，我更將全篇細讀，作最後的改訂，然後將修改刪節的部份聽清，簽註貼上，送呈總理親校。總理對我的簽註意見，若予採納，則親筆在稿上修正，修正後再命我讀校，我讀校如前，再呈總理，總理復修正後，又命我讀校，我復讀校如前，必至總理完全認爲妥適而後止』。又說：「

當時總理住在廣州河南士敏土廠，所有交我讀校的演講稿，都是由那兒派專差送到學校來。凡是上午送來的，當日就要我派專差送回去，假如到時候還沒有收到，總理就要叫人來取，因此我讀校完畢一段，便送閱一段，每次演講常有二次修正，於是學校和士敏土廠的道上，送稿或取稿的專差，不絕於途」。國父對三民主義演講和筆記的重視，由此可見。

由於國父要將他的演講作為宣傳的課本，所以他在講演時和記錄中，都力求通俗，使人人易於瞭解和接受。據海濱先生記述：「有一次總理講民權主義，裏面有一段，我看了不很明白，特意拿了原稿去見總理。……總理拿了原稿問我從什麼地方起，到什麼地方止？我指出後，總理不待思索，立即將這一段全部塗掉……說：『三民主義的學理雖然非常深奧，却要使凡識



字的人，個個都看得懂，這樣，我的主義才能普及民衆。假使你都看不清楚，那末看不懂的人就不知有多少，所以全部刪去」。同時，大家都知道國父是精於英文的，但據海濱先生說：黃昌毅先生筆記時，關於外國名詞，凡有附註英文的，國父都將之刪去，以免一部份讀者發生困難。現在三民主義只有民權主義第六講說到一種機械的名詞和民生主義第一講對社會、社會學、社會主義等名詞附註有英文，但都附有音譯，可見國父力求淺明的苦心。

國父不但對三民主義的筆記，用心訂正，對其印行也非常認真：當時每次演講記錄訂正後，便在中國國民黨週刊發表，民族主義講完後，國父便交宣傳部印行單行本，國父還親筆寫了一篇自序，同時叮囑要用三號字印行，以便年老目力不足者閱讀。據海濱先生記述：「三民主義的

去年中山先生在廣東大禮堂演講三民主義，座為之滿且立，四週者亦數百人，每講時均愈精神而聽者亦不少，倦每完一義由黃君昌毅記後使魯枚讀之并使魯

國父演講三民主義讀校者海濱（魯）先生及鄒先生遺墨。

單行本和週刊上所發表的，我都詳細讀校，一有錯誤，立即更正，總理尤必親自核閱，有錯立改。記得當時週刊某期所載演講詞之後，增添了不妥的一兩句，總理立將負責人處分，不稍寬假」。可見國父的認真和重視。

三民主義的印行，民族主義是民國十三年四月出版的，民權主義是同年八月出版的，民生主義只講了四講，沒有講完，但因為國父於是年十一月北上，故在十二月先將四講出版，而在其後註明「未完」。三民主義印行後的講稿，據海濱先生說：「三民主義第一、第二次修正稿，均存我處，不幸倭機濫炸廣州時被燬，稿中所修正的都是總理親書筆跡」，但鄧慕韓先生在抗戰時曾由廣州攜出一經國父親筆修改之原稿，其中修改之筆跡計二千八百八十三字，而與通行本相較，則遺漏者有五千餘字，相異者有九千餘字。此一稿本據說是國父北上前存放在廣州大本營的寢室書桌抽屜內，國父臥病協和醫院時曾告知侍病同志，嗣由鄧慕韓先生攜出，幾經輾轉，現歸由黨史會珍存，但這究竟是不是國父在三民主義印行後的最後修訂本？抑只是印行前的一次修訂稿？則尚待詳加考證。此外，民族主義出版時，國父親書的自序，影印後國父將原稿給海濱先生，海濱先生將它裝裱成冊，曾請了胡漢民、吳敬恆、于右任、譚延闓、黃昌毅、謝持、沈定一諸先生分別題跋。珍藏於滬寓，亦於抗戰時流失，年前在港發現，亦幾經輾轉，才設法收回，交

由黨史會珍存，我因曾參與其事，也保存了一份影印本，多人題跋中，亦有敘及三民主義宣講之經過，而為外間所未知者，至足珍貴。

國父宣講三民主義的最大遺憾就是：民生主義只講了四講，便因督師北伐而中輟；嗣又離粵北上，於翌年三月因病逝世，使這一有系統的演講成為永未完成的演講。國父沒有能將他的三民主義全部思想昭示國人，這實在是國家民族和世界人類的最大損失。國父最後一次演講民生主義第四講是在八月廿四日，九月十二日，國父便往韶關督師北伐，十月因北方政局發生變化，當時馮玉祥、段祺瑞等電邀北上，國父乃於卅日返廣州商議，旋於十一月十三日啟程北上。在這期間，國父雖軍務倥傯、百事叢集，但他仍時刻以宣講三民主義為念，決定北上後，更準備在北京繼續宣講三民主義。昌毅先生在上述跋記中便有這樣一段記載：

當十一月三日決定離粵後，遂諭昌毅曰：「我現在決定到北京去從事和平統一，借此機會可在北京繼續講演民生主義的總論，一講是民生主義的總論，講完三民主義以後，如果再有工夫，還要講五權憲法，你一定要放棄現在的任務，同我到北京去記述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吧。」昌毅對曰：「只要有事做，自然情願隨先生去。」所以隨先生自韶關回廣州摒擋一切，北赴上海，并假道日本來北京。沿途旅行，無論是遇何風波勞動，先生尚閑關於民生主義諸參考書籍，滿擬一到北京後，稍事休息，即可從事預定之演講工作也。……豈料先生甫抵津門即病，一病而不復起也耶？！」

三民主義筆記人黃昌毅先生記述國父演講經過遺墨片段。

「當十一月三日決定離粵後，遂諭昌毅曰：『我現在決定到北京去從事和平統一，借此機會，可在北京繼續演講民生主義。你的行止是怎麼樣呢？可不可以同去寫民生主義呢？』昌毅正預備答話，先生又曰：『民生主義還有四講未完，兩講是居行，一講是民生主義的總論，一講是三民主義的總論，講完三民主義以後，如果再有工夫，還要講五權憲法，你一定要放棄現在的任務，同我到北京去記述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吧。』昌毅對曰：『只要有事做，自然情願隨先生去。』所以隨先生自韶關回廣州摒擋一切，北赴上海，并假道日本來北京。沿途旅行，無論是遇何風波勞動，先生尚閑關於民生主義諸參考書籍，滿擬一到北京後，稍事休息，即可從事預定之演講工作也。……豈料先生甫抵津門即病，一病而不復起也耶？！」

此外，邵元冲先生所著「總理學說」也說：「民生主義尚祇四講而有津京之行，總理時預期在北京大學完成民生各講，故攜參考書頗富，於舟經日本時，更增購新書盈篋。既抵京，臥病行館，猶於枕上批覽不輟，余旁視之，則討論居室之書也。」可見，國父原準備在北京完成三民主義的宣講，而且在病中仍不釋卷，但天不假年，使此宣講未能完成，至堪痛惜。

三民主義的宣講既未完成，究竟應該還有幾講？又，未講完的，是什麼內容呢？對此，有好些不同的說法：一般人因為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都是六講，認為民生主義也同樣是六講，尚有兩講未完。據海濱先生在上述跋記中說：「民生主義據云將演講七次，僅講四次」，則尚有三講。而依上引昌毅先生的記述，則尚有四講。證以國父在民國十三年五月卅日應上海中國晚報之請，作了一次播音演講，曾說：「三民主義，我近來在廣東高師學校每個禮拜講一次，每次講了兩點多鐘。民族主義，我講了六個禮拜才講完，民權主義，也講了六個禮拜才講完。不久再來開始講民生主義，大概也要講六個禮拜、八個禮拜，說不定的。」可見，國父對民生主義特為重視，起初準備作六講至八講，尚未完全決定，後來大概準備再講四次，三次為民生主義，一次為三民主義總論，鄒、黃兩先生所記頗屬可靠。至演講的內容，以昌毅先生所記為最詳，邵元冲先生所記可作旁證。但據戴季陶先生在「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中說：「此次我在孫夫人處看見先生親筆記出的民生問題目錄當中，在食衣住行之外，還有兩個題目：一個是養生，一個是送死。可惜我當初關於這兩個問題，都沒有聽過，先生直接的解釋。」先生曾對夫人談過一點大意

。可見在未完成的民生主義演講中，除了住和行的問題外，還有育和樂的問題，因為廣義的養生，除生育養育外，還應包括康樂。而食、衣、住、行、育、樂是民生六大需要，自應同時解決，才是民生主義的完成。所以，如果未完成的四次演講中，有三次是關於民生主義的演講，其內容可能包括住、行、育、樂四大問題的解決和民生主義的總結。

三民主義的演講未能完成，固然是國民革命一個無可彌補的損失，但幸而在 國父逝世後，總統 蔣公繼承遺志，領導革命，除了致力奉行遺教，實行主義，同時也致力闡揚 國父思想，將

之發揚光大，使其益為充實光輝。他除了闡明三民主義的理論基礎和思想體系外，對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意義和內容，也有許多發揮和充實，更曾於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手著「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對未完成的民生主義演講，加以補充發揮。在序言中，總統 蔣公便說：「民國十三年，總理在廣州演講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六講、民權主義六講都已講完，民生主義只講了四講，第一講是講民生主義的原理，第二講是講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兩個辦法，第三講以下，總理預定要講民生四大需要——食衣住行，但是他只講了食與衣兩節，就沒有再講下去了。住

與行兩大問題和解決的辦法，從實業計劃裏可以看出一個輪廓，做我們研究的基礎。但是我們從 總理在民國十三年以前關於民生主義的演講和論著裏，可看出民生

問題除食衣住行外，還有育和樂，……我們如不把育樂這兩個問題和食衣住行這四個問題一併提出研究，就不能概括 總理的民生主義的全部精神和目的所在。……我現在要將 總理平生對於育樂問題有關的私人談話所提到的政策，以及其平生對育樂問題所設想的措施，和我個人所領會與擬議的方針和方案，加以闡述，或可少補 總理民生主義全部講稿中未完部份的缺憾」。

國父的三民主義思想，經過了總統 蔣公的發揚補充，遂益完備充實了。

現在總統 蔣公也已逝世，這兩位民族救星、革命導師的精神生命雖已和三民主義思想與國民革命事業連在一起，而將永垂不朽。但繼續發揚三民主義和完成國民革命，却是後死者的責任。這一次中國國民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總統 蔣公逝世後召開，正如 國父逝世後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一樣，是一次「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會議，我們看到大會的宣言和各項決議都強調實踐三民主義是當前的奮鬥目標和神聖使命，可見發揚三民主義思想并實踐篤行，實為我們目前共同努力的途徑。我因為追懷當時恭聆 國父宣講三民主義的情況和憶起有關 國父宣講三民主義的經過，益感三民主義思想的博大精深，也益感當前國人共同責任的重大，用書所感，以期共勉。

尚望同老讀者本此基礎觸類引伸匡補闕遺更正條理使成為一完善之書以作宣傳之課本則其造福於吾民族吾國家誠未可限量也
孫文序於廣州大本營
民國十三年三月三十日



國父手書三民主義序片段

三民主義筆記人黃昌毅先生

三民主義思想并實踐篤行，實為我們目前共同努力的途徑。我因為追懷當時恭聆 國父宣講三民主義的情況和憶起有關 國父宣講三民主義的經過，益感三民主義思想的博大精深，也益感當前國人共同責任的重大，用書所感，以期共勉。